

沪嘉高速公路免费,已过半年。沪嘉高速公路的免费像一根火柴,点燃了公众对高速公路免费的探讨热情。有关专家及高速公路业内人士表示,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免费,尤其是对企业运营的高速公路来说,不现实。(7月10日《中国经济周刊》)

### 高速公路免费也可来个“三步走”

沪嘉高速公路免费的最大意义在于,它告诉我们,中国高速公路原来也可以跟世界接轨,原来也可以实行免费开放。当前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,为经济松绑,为企业减压,已成当务之急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曾经发布的数据显示,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率高达18%,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10%,更高于日本的6%。而根据媒体的调查,中国的高速公路收费暴利,其利润甚至超过石油、房产等“暴利”行业。无论惠民生、促发展,还是就其公共属性来看,高速公路免费开放势在必行。

专家称,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免费不现实。这里,要么是误读民意,要么是混淆视听。这些年来,虽然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呼声日涨,但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媒体上,我们听到几个在免费前面加上“全部”或者“马上”的?由于资金、人员等一系列问题,高速公路“全部”“马上”放行,面临着实际困难。公众对此心知肚明,希望的只是高速免费能够有个时间表,能够按计划分步实施,这难道也“不现实”吗?就当前实际及公众期望来看,高速免费完全可以来个“三步走”。

第一步,对于那些已经到期或者超期服役的高速公路,按照规定立即免费。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,一些高速公路收费无穷期,明明已经到期了,却还另立名目或者虚晃一枪,继续收费。据媒体报道,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在1996年已全部还清了贷款,收费站2000年就应该撤销,可时至今日还在收费。为了取消这座桥的收费,河南省政协委员张朝祥已经呼吁了三年。在今年初全国“两会”上,张朝祥继续上交“取消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收费站”的提案。这样的收费站有什么存在的理由?

第二,对那些正处在收费期的高速公路,应该重新听证收费标准和收费期限。一条公路建设资金到底多少、借贷多少,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细账;到底应该收费多少年、收费收多少,也完全封闭运行,公众根本没有知情权、参与权;收来的钱,到底是用来养路了,还是用来养人了,简直是“糊里又糊涂”。这一情况下,应对收费标准和收费期限公开公示、重新听证,以还公众一个明白。

第三,对那些正在建设或者计划建设中的高速公路,应该明确财政资金配套。可以把借贷修路当做是历史遗留问题,但不能任由历史遗留继续下去,甚至又新增历史遗留。现有形势下,再重复过去的老路肯定不行了,财力的增强,公众的期望,都要求财政资金的配套。即使财力不需要借贷一部分,也应该量力而行,压缩借贷规模,确保借贷真正用在修路上,收费真正用在还贷上,以控制并逐步减少新增收费公路。

一步到不了罗马,但一步不走却只能遥望罗马。真正做到“三步走”,一步一步往前走,高速公路免费完全可期可成。 毛建国

改革成本不能仅从既得利益者内部的视角来考量,它需要走出“本位主义”。改革同样需要一场“成本核算”,这样的核算必须让公众作为主体更多地参与其中。

### 改革也需要一场“成本核算”

近日,有两个关于“改革阻力”和“改革成本”的报道,值得评说。

一个是新华社的报道,温州车改因“大刀阔斧”备受关注,但高额“车补”是否涉嫌“变相福利”也引发一些质疑。温州市经信委某负责人坦言,人们对公车改革的期望值很高,但对大多数干部来说,毕竟公车象征一种待遇,用差异化的补偿,能“减少改革的阻力”。

第二个是,湖北武汉市教育局人员超编一倍左右,该教育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,也为这种现象找到了理由——50岁的人退二线,是一种资源的浪费,所以给他们发工资“也是改革的成本”。

表面看来,这些回应似乎并非毫无道理,甚至是“理直气壮”的。但凡改革,总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,要想清除障碍,减少阻力,总是需要付出一些成本,这一点不容否认。但问题在于,这些成本的该谁怎么拿,是不是付出再多都是“对且必要”的?显然不是这样。

譬如公车改革,其整治目的就是重建公车与公车使用者的关系,祛除使用者过重的公车利益支配权,本就是要想触动一些官员的既得利益,如果为了所谓“减少改革阻力”,付出了高于改革前的“成本”,这样的改革还“合算”吗?至于用“超编”来解决机关年龄结构老化,等于是用违法、违规行为来求解决效率问题,即便目标达成,这样的“改革”也明显有些“蚀本”。

公车改革也好,单位超编治理也罢,最终都衍生出“改革成本”的托词,说到底不过是一种“本位主义”。革自己的命总是艰难的,改革牵涉到的是实际收益,倘若只是从当事者的角度言之,习惯了公车私用的官员,习惯了“退居二线”、不上班拿工资的职工,自然会缺少摒弃既得利益的气度和胸襟,难以催生出真正的诚意和勇气。如此之下,出现“理直气壮”的“必要成本说”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改革成本究竟应该怎么算?显然,改革成本不能仅从既得利益者内部的视角来考量,它需要走出“本位主义”。道理很简单,改革成本是具有转移效应的。倘若改革过于注重减少内部压力、追求稳定,那么它必定会将改革压力转移给社会,从而让改革遭遇更多的阻力,令改革的整体成本变大。

具体到公车改革和超编治理上,为了当事者情绪稳定而高额车补、机构臃肿两倍以上,它看似减少了内部的成本,却增加了纳税人为之付出的经济成本、社会对制度设计者的心理失望成本,乃至公车改革和超编治理被拖延的时间成本。相对于短期的、小圈子的稳定,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。

一些改革探索者异口同声的“必要成本”回应,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:改革在进行,对改革阻力的认识必须刷新,改革同样也需要一场“成本核算”,这样的核算必须让公众作为主体更多地参与其中。否则,当利益再分配,种种“必要成本”式的借口必会层出不穷。 京文

# 稳增长要靠减税减负而非货币放水

6日~8日,温家宝总理到江苏省常州、镇江、南京等地进行调研,并主持召开辽宁、江苏等五省经济形势座谈会。温家宝指出,要进一步加大预调微调力度,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,特别注重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,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。与此同时,9日,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经济数据,引人注目的居民价格消费指数CPI同比上涨2.2%,创下了近3年以来的新低。

这样,在GDP增速和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双双回落的情况下,下半年的宏观政策以什么样的组合遏制经济下滑,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就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。笔者观察到,对于CPI的持续回落,机构和专家大多认为,通胀水平的下降为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较大的空间,这种观点暗示的政策信号是非常明显的,也就是说,为了遏制宏观经济的下滑,在物价下降的情况下,货币政策本身将会有更大的放松空间。

在一定程度上,通过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,对刺激经济回升是有一定的作用的。但是,笔者担心的是,由于物价的回落,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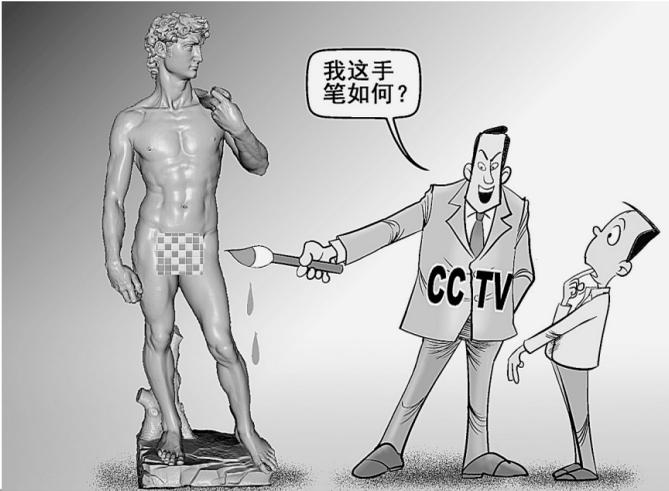
理层将不再担心放松货币导致恶性通胀,因而将稳增长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货币政策,而不是寄托在以减税为核心的财政政策,以推动民间投资,加快收入分配、资源价格改革为核心的深层领域的改革政策,以加大结构调整和升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。对于今天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究竟如何看待,温家宝总理说得明白并强调,“我们提出稳增长,绝不是短期的应对措施。稳增长一定要同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”。这种观点是非常重要的,也是非常正确的。众所周知,在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,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情况下,在制造业和中小企业面临极其困难的情况下,货币政策的放松,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房地产,在宏观政策乐观的情况下,房地产的反弹短期可能会带来漂亮的数字,但事实上,无论是中期,还是长期,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又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和更多的问题,这是管理层必须考虑的。

基于此,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时特别强调,要更加注重“转方式、调结构”,把稳定投资与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,与积极稳妥推进

城镇化结合起来,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,与调整经济结构、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,努力实现速度、结构和效益的统一,为更长时期、更高水平、更好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笔者对此深为赞同并一直认为,四年前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已经证明,不进行深层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任何稳增长措施只能见效于一时,在政策的药效消耗殆尽之后,没有抓住时机进行调整的整体经济将再次陷入低迷,并且由于贻误调整的时机而让问题更加严重。

现在,中国很多中小企业税负沉重,用工成本上升,生存都不易,遑论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了。但我们须谨记,如果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,不下决心加大减税的力度为企业减负,不下决心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,为民间投资营造更大的生存空间,不下决心通过激励机制支持企业通过结构调整进行产业升级,不下决心调整收入分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,而仅仅寄希望于货币的放松刺激短期的增长,除了获得短期漂亮而虚幻的有毒数字之外,恐怕只会再次贻误转型的时机。 马光远

7月9日,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100周年纪念,国家博物馆同时推出意大利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。近日,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时,现场展出的著名雕像大卫阿波罗生殖器部位被打上马赛克,央视此举随即引发网友争议。从3D泰坦尼克删裸戏到大卫雕像被打马赛克,按这种趋势,以后得维纳斯戴胸罩了。面对网络上呈一边倒的负面声讨,央视在新闻首播3个多小时后作出改变。此新闻复播时,大卫阿波罗身上的马赛克已经被去除。 焦海洋/图



## 公平公正欠缺造成留守儿童人格缺陷问题

“2012全国留守儿童健康人格研讨会”日前在京召开。会上发布的我国首份“留守儿童健康人格报告”称,农村留守儿童人格缺陷问题堪忧,突出表现在学习焦虑、与人沟通焦虑、处事敏感、易冲动等方面。(7月7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留守儿童,是这个时代悲剧的一群。在最需要关爱和呵护的成长时段,他们不得不与父母分离。留守儿童还是可怜的一群,孤独的一群,离开了社会化的一群。所谓社会化,就是一个人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群体的各种习惯的过程。依照社会学家波普诺的说法,像留守儿童,“他们的经历从某种角度说明了我们在早期与他人接触中是怎样被‘人性化’了的。一个人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就是所谓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。孩子的抚养,正规教育,以及学习社会角色和文化价值观都是这个社会化过程的组成部分”。在社会学家看来,没有社会化就没有社会。

在世間,人是最宝贵的,人比钱重要,这个道理打工的家长们可以说都懂。人心都是肉长的,那些离乡打工的父母没有哪个人是铁石心肠,没有哪个人不爱自己的子女,而且常常根据别人对自我的反映来改变自己印象、自我形象。留守儿童的成长则不是这样,从某种程度上说,他们是丧失自我的一群。

留守儿童问题,还可以说是由本土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的后遗症,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不说可以避免,但总是有改善的可能。但显而易见的是,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,留守儿童的规模还在持续增长,社会性焦虑亦在增加。留守儿童问题是家庭问题,它还是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从社会学的层面讲,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,父母的作用无法替代,父母的承认、赞同和支持对富有创造性的,人都极具重要性。为取得创造性的成就,一个人必须具有强烈的自信心。这种信心往往来自于自己的父母和亲朋好友所提供的社会化。留守儿童身上所形成的种种人格缺陷,都可归于社会化未形成的缺陷。

误入子弟,从来都是大事。留守儿童问题是牵扯千家万户幸福平安的问题,是关乎无数个家庭命运的问题。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造成了留守儿童问题,教育制度设计缺陷造成了留守儿童的困境。留守儿童人格缺陷问题堪忧,是社会良性发展担忧。教好孩子,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责任。教好孩子,就是教好未来。今语

国家人口计生委表示,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现状下,老年人照料将与计划生育家庭养老相结合,并进一步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力度。(7月8日中国广播网)

## 养老责任主体是家庭还是政府?

自从2001年起我国进入了老年型社会,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及规模在国际上名列前茅。当下,65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1.2亿,到2050年,将是现在的三倍;大概用25年的时间,65岁及以上的老人将从7%上升到14%;养老问题之所以急切,还在于,国内进入老龄化的背景是“未富先老”,老人们手里钱不多;由于当年实行计划生育,出生率下降,人口红利正在消失,赡养老人的人力资源正在锐减,这对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严峻的挑战。尤其在农村,年轻人

纷纷流动到城里,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严重。

如何应对挑战?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思路是:将进一步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扶助,说白了,就是为老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这意味着,养老的主体还是家庭的年轻人,而不是地方政府。这是远远不够的。

目前,物价居高不下,收入分配改革尚不到位,中低收入者囊中羞涩。而且前几年,房地产价格暴涨,促使国内消费者疯狂购置房地产,

提前透支了将来的资金。其他主要大国,一个典型家庭的资产配置中,房产大致占30%,中国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率高达50%;其他国家的养老金收入约占到家庭总资产的20%左右,中国家庭总资产中的养老金收入低于5%。不难理解,在人们收入水平、消费能力得不到大幅提升的情况下,把养老的主要责任推给年轻人,势必使家庭养老成为年轻人难以承受之痛。地方政府应成为未来养老的责任主体,更多承担起养老的责任。 于文军

据深圳市教育局发布的今年中招计划显示,招生计划超出报考人数,总体的学位供给比往年宽裕,而且,在57091人的中考报名总数中,深圳户籍考生29000人,占一半有余。但是,依据政策,非深圳户籍考生不升反降,深圳“四大名校”的正取生和指标生均不招收非深圳户籍考生,只有少量择校生名额留给非深圳户籍考生。(7月9日《法制日报》)

## 异地高考未至,中招已釜底抽薪?

所谓深圳“四大名校”,指深圳中学、深圳实验中学、深圳外国语学校、深圳市高级中学,“四大名校”算是深圳市高中阶段教育的佼佼者。现实经验告诉我们,进入一所优质资源初中,意味着跨入优质资源高中的几率大增,进而为考入优质资源大学奠定基础,这也是当前基础教育择校竞争激烈的原因所在。以政策的形式将非户籍考生拒之于本地的名校之外,意味着非户籍考生三年后高考竞争力减弱,相对于呼之欲出的全国异地高考政策,无异于釜底抽薪。

查阅相关资料显示,即便是在“高考洼地”的北京和上海,拥有“北京市工作居住证”或者“上海市蓝印户口”的考生,都可以平等参加当地中考并进入中招程序,并未显示明确的“限报”规定。其实,允许非户籍考生就地参加中考并平等录取,不仅仅是基于宪法、教育法理,实现“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”的回归,更是在人口频繁流动的时代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。异地高考被呼吁了若干年,而今正欲起步回归公平,假若各地在中招中对非户籍人口进行限制,那么无疑是在将限制的中招门槛前移。

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,而且人口流动性大。资料显示,截至2010年末,深圳市实际管辖人口超过1300万,其中本地户籍人口总量为250多万人,常住人口高达900多万人。这座城市的人口结构状况,决定了在中考以及未来实行的异地高考上,不应为非户籍人口做太多限制性规定,否则就会伤及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大多数人。譬如今年限制非户籍考生进入“四大名校”,从数量上已经限制了将近一半的中考考生。

深圳又是一座似乎让人看不懂的城市,基于频繁的人口流动,其很多政策都或隐或现地体现出对非户籍人口的某种担忧。譬如去年出台的“禁止民工上访讨薪”政策,后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撤回;再如今年关于医疗保险“医保缴费中断超过3个月,连续缴费清零”的新规,政策层面上无不对非户籍人口存有某种程度上的戒心。但是,深圳又往往表现出开放包容的一面,一座在高等教育上勇于创新——创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区南方科技大学的城市,何以在中招上表现得如此拘谨排外?

无可否认,如今的人口流动已然不是过去仅为谋生的阶段,而越来越是一个人、一个家庭综合权益增长诉求下的驱动。其中,子女享有平等受教育权是家庭综合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满足这种权益实现,就会成为人口流入地;限制这种权益实现,就会成为人口流出地——这在人口红利渐渐消退的社会背景下,不仅仅是城市气度的问题,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无论是深圳还是其他地方,在中考和高考开放方面,都值得认真而长远的考量。 燕农

## “馒头许可”的存废都让人揪心

去年4月1日,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启动实施“食品加工小作坊许可证管理制度”,并在有关“红头文件”中进行了明确表示,对此有网友称加工油条、卖个馒头也要办行政许可,明显是在以证代管。后甘肃省法制办认为,所谓的“加工食品许可”属于规范性文件自行创设的行政许可事项,无法法律依据,应在30日内予以修改或废止,必须停止执行。(7月10日《工人日报》)

很显然,如果加工油条、卖个馒头也要办行政许可,只能说明当地的行政许可肯定存在过多过滥之嫌。然而,这样的“行政许可”竟然在民众的质疑声中强行推进了14个月后才叫停,既然所谓的“加工食品许可”属于自行创设而无法律依据,那么该项政令又是如何出台的?监管和审查何在?“纠正”何以姗姗来迟?

如果说“馒头许可”的炮制出炉“先天不足”,引发社会争议,那么,“馒头许可”的被迫叫停其还是让人感觉无比的揪心。有缺陷的、有违法嫌疑的、彰显权力越位的行政许可被取消,当然是一件好事,可问题的关键在于:关于行业发展和大众利益的政令如此朝令夕改,从一个侧面所折射出公共决策的长官意志化和随意性,并不仅仅局限于一道“馒头许可”,而所伤害的也不仅仅是某一个决策部门的公信力。

类似的朝令夕改俯拾皆是,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式:出台的时候“拍脑袋”,推进的阶段“大踏步”,引起社会质疑后被暂缓执行或者撤销。广东某市出台禁止养猪规定数月被取消,山东某区政府出台红头文件强制要求公务员卖房被紧急叫停,湖北某县发红头文件规定全年公务用车数量很快被废止,黑龙江某市打狗禁令数日后就被推倒重来……也不能说这些“夕改”的“朝令”都具有权力自身的利益考量,但肯定隐含着权力决策的狭隘和盲目、左右手互相监督的自由裁量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则甘肃省叫停“馒头许可”的新闻报道最后,有这样一段值得品味的话:“6月7日,甘肃省委、省政府共同启动效能风暴行动,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围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展攻坚战,继续清理、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……”“效能风暴”也好,清理违法违规行政审批事项的“攻坚战”也罢,如果虽然立竿见影,但却不是治本之道。只有真正引入公共监督避免决策失误,才不至于出现朝令夕改,更不必面对问题爆发发展费时费力的集中整治和运动性执法。 陈一舟